

中国，中央之国、居天地之中，治于四夷，正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尚书·梓材》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诗经》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等。中国，又称华夏、中华。《书经》记“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左传》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即礼仪之邦、衣冠上国。中国与华夏之称谓，皆为国人自称之名，彰显出一种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与衣冠上国之状态。那么，古代世界其他诸国又是如何称中国呢？这种称谓又蕴含着何种信息与意义？

秦、秦奈与赛里斯

古代世界最早出现有关中国的称谓为秦（Chin）或秦奈（Sinae）与赛里斯（Seres），这些称谓出现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期间。秦或秦奈，一般为从海路接近中国时的称谓。该名称被认为经由马来人传下来——马来人将秦王朝称为 Chin，并以其指中国。古代印度文献《摩奴法典》《摩诃婆罗多》《政事论》提及 Cna，并称此地产丝。古代波斯史料称中国为 Machin，即 Ma+Chin，意为大秦、大中国。Chin、Chinas 在传入西方之后转音为 Sin 或 Thin。1 世纪左右，一位罗马商人从红海出发到达印度西海岸，并著《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一书。他在书中记载了从红海至印度西海岸的航行路线，提及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行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大洋止于某处，那里有一座被称为秦奈的大城，产丝。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这位作者可能也是西方世界首次使用该称呼中国的人，之后 1—2 世纪期间著名的埃

古代世界怎样称呼中国

□ 李大伟

桃花石

继秦、秦奈与赛里斯之后，古代世界对中国一个流行的称谓为“桃花石”（Taugas）。7 世纪早期，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在《历史》中曾记载了一个名为桃花石的大国：“桃花石距突厥一千五百里，居住在桃花石的外邦人，为人数众多而极勇敢的民族，世界诸国几乎与其无法匹敌……桃花石从不受王位纷争之扰，这是因为他们据家族血统选取君主……桃花石国盛行偶像崇拜（佛教），但有公正的法律……生产赛里斯丝线的蚕虫在这个民族中到处可见，它们已经历经许多代的变化，色彩斑斓。”西摩卡塔所记的桃花石显然指古代中国。但是关于 Taugas 一词之意义，中外学人却有多种不同认识。如法国汉学家德经认为 Taugas 应为大魏（Ta-göei），即鲜卑拓跋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元魏政权；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进而认为其应指元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Thak-bat）族；德国汉学家夏德认为应指“唐

家”，日本学者桑原骝藏引申为“唐家子”，即中国的唐王朝。张星烺与张绪山等则主张 Taugas 为大汉，其中张绪山指出大魏之说并没有其他证据显示外族以此名称称呼中国，拓跋族人在入住中国北部之后采用汉化之魏，拓跋之称扬名于外族可能性不大，而西摩卡塔是据唐代之前史料进行记载，Taugas 自然不能指唐家或唐家子，并称：从中国与北方以及中亚民族关系论，两汉时期最为频繁，且影响最大；在与外界交往之时，汉使常自称大汉，外族亦因此称中国为大汉，大汉一名便成为周围族群对中国的称谓，并经中亚诸族流传至西方，转音为 Taugas。

桃花石此名之汉译，最早出现在长春真人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1221 年，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去中亚，曾途经阿里玛城（今新疆霍城县境内），见到当地“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却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此亦显示中亚人以桃花石称中原王朝，因此西摩卡塔所记 Taugas 应为大汉之意，大汉又成为古代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流行称谓。

契丹

蒙古时代，蒙古一统欧亚大陆之格局让中西方交流日益便利。此时古代世界又出现了一个对中国的称谓，

即“契丹”。这一称谓出现在诸多记述之中，如元代入华的一些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提及契丹，其中约翰·柏朗嘉宾称契丹国近海的一部分领土迄今尚未被鞑靼人征服，这些人信奉异教，自有书写文字；威廉·鲁布鲁克更是称中国为大契丹国，即古代赛里斯国，最好的丝绸出自他们之手，其人称之为赛里克（Seric）——他显然知道此时的契丹即古代赛里斯国。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称中国北部为契丹、称中国南方为蛮子。蛮子，即蒙古人称中国南方之称谓。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亦提及契丹国有很多偶像崇拜者，信奉释迦牟尼的泥塑偶像。

契丹为中国东北部游牧民族，916 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契丹”。大同元年（947 年），耶律德光率军攻占开封灭后晋，改汗称帝，并改国号为“辽”，1125 年被金国所灭。辽灭亡前夕，耶律大石据中亚诸地建立西辽，并不断在西域、漠北、中亚等地区扩张。契丹人在中国北部统治长达 200 余年，西辽在其灭亡之后又统治中亚诸地长达数十年，一度极为强盛，并于 1141 年击败塞尔柱帝国，更是威名远播欧亚诸地。契丹人在中国北部的兴起，导致从陆地方向获知中国人或国家，将中国称之为契丹。这一名称不断向西流传并被欧洲人得知，直到元代仍如此称呼中国。契丹之名一直沿用至明代。15 世纪初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曾出使中亚

撒马尔罕的帖木尔王廷，在其所著游记中仍将中国（此时为明朝）称为契丹；1419—1422 年帖木尔之子沙哈鲁派遣使者到达明廷，此时这些使者仍将中国称为契丹；15 世纪意大利商人与探险家尼克罗·康蒂亦是如此称之。直到 16 世纪，仍有一些欧洲的探险家从陆路行进寻找契丹。

“China”的直接由来

由于对东方知识的淡漠，古代世界对中国的称谓秦或秦奈、赛里斯、桃花石与契丹等，经常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这些名称也往往同时出现。1603 年葡萄牙人、耶稣会士鄂本笃经印度从中亚到达中国之时，便怀有探究契丹究竟是否为中国之目的。当然，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契丹就是秦。近代以来，秦或秦奈这一古老的名称再次成为西方对中国的流行称谓，葡萄牙人在 Chin 之后加 a 音，即 China，便形成今日欧洲诸国对中国的称谓 China。

纵观古代世界对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常以朝代命名，如秦、秦奈、桃花石（大汉）与契丹等，或以中国输入外部世界的重要物资丝绸（赛里斯）等称呼之，其中以朝代之名称呼中国具有一定的延后与持续性，且从北方陆路进入中国与海路进入中国所得出的称谓并不一致。这些称谓显示古代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中国历史之变迁，呈现动态、变化之特点。当然，限于古代知识传播、保存与交流的局限性，各个名称所具备的内涵也反映出古代世界，尤其是西方诸国对中国地理认识之不足。

世界史林

（上接 1 版头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充满着对传承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的自信，对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自信，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自信，对党和国家事业光明前景的自信。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自信，这一思想才有了这样的大气魄、大视野、大格局，才有了这样的理论成熟、战略定力。正是用这一思想武装起来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以自信的气度、从容的姿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步伐坚定向着宏伟的目标迈进。

宽广的世界眼光。世界眼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胸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96 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具有比其他政党和团体更宽广的世界眼光，善于从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不断校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航标，破浪前进；善于团结和动员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力量，聚合起磅礴之力，为人类进步事业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的党。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百年不遇的世界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政治家

（上接 1 版二条）在世界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战争形态迅速演变、国际军事竞争更加激烈的战略环境下，纠治备战打仗不力现象，打造与民族复兴相适应的世界一流军队战斗力，愈显重要而紧迫。我军只有聚焦备战打仗，常备待发之势，练好胜战之功，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胜算，才能切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宣将剑戟多砥砺，雄师胜战天下安。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抓好备战打仗，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这一重要论断，既强调了战斗力标准的根本性、唯一性，也指出了坚持战斗力标准的全面性、彻底性，军队一切工作都无一例外。我军必须进一步牢固确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校正军

和战略家的恢宏视野、战略思维，鲜明提出一系列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新理念新主张，占据了人类道义制高点，凸显了中国特有的大国风范、大国担当，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应当看到，这一思想着力把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探索和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构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体现独特文明特征，独立于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制度体系、目标体系、战略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刻凝结着当代中国对人类更好未来的艰辛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自觉的担当精神。担当是一种责任、勇气，也是一种刚毅和胆量。只有充满责任担当的人，才敢于直面并破解各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精神风范，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崇高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积极推动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积极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倡导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多次强调的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着力建构的新型大国关系与外交新格局等，都显示出敢于担当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既敢

队建设发展的参照坐标，对“和平积习”来一个大起底、大扫除，使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强军兴军诸领域各环节，切实使全军上下形成练精兵、谋打赢的正确导向，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深刻揭示了信息化战争体系对抗特点，为我军作战体系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我军必须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必须加紧构建完善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努力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坚持把发展新型作战力量 and 保障力量作为战略重点，着力解决制约作战体系建设的短板，增强我军新质作战能力，提高部队战斗力整体水平。

扎实做好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提出明确要求。在国家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不懈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

于直面并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矛盾、问题和难题，也敢于直面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矛盾、问题和难题，还勇于应对许多复杂的世界性难题。他勇于担当起对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和对人民的责任，勇于扛起一代人应当扛起的责任，体现了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无畏勇气、鲜明态度和坚毅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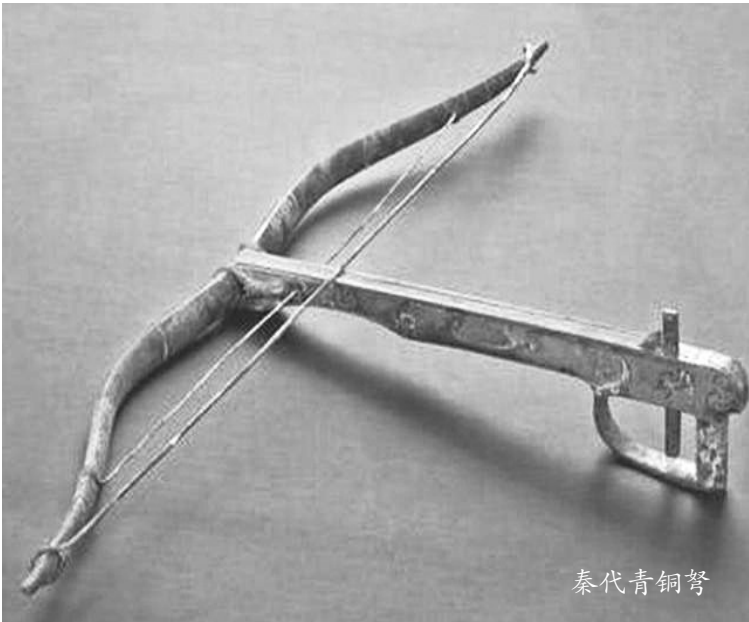
扎实的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的实践，催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方位的、开创性成就的取得，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的发生，既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巨大理论威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力解决信息能力弱等短板弱项，把各项准备工作往前赶、往里抓，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根据各战略方向使命任务，立足复杂困难情况，加强形势研判，把敌情我情、战场情况、作战指导和战法运用搞清楚，力争知己知彼、料敌在先、未雨绸缪、掌握主动，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应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备战打仗重在提高战斗力，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深刻揭示了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和本质要求，抓住了备战打仗的关键要害。推进新时代备战打仗，必须坚持把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把科技作为核心战斗力，以信息化为发展方向，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深入探索信息网络和情报链、指挥链、打击链、保障链作战运用，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军队战斗力，赢得国际军事竞争的战略主动权，切实做到“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长、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秦代青铜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战国时代，各国的武器装备竞赛如火如荼。当时有“强弓劲弩皆从韩出”的说法，但是如果战国时期韩国人真的要说他们的武器天下第一，那么秦国人肯定笑了。秦有天下，武器精良，功不可没。秦国兵器锐利，是有坚实基础。

秦国武器设计思路清晰，一寸长一寸强。在冷兵器时代，战士手中的兵器长一点，生存和获胜的机会就多一分。《史记》记载“荆轲刺杀秦王”，秦王绕柱而逃，企图拔剑还击，由于佩剑过长，三次拔剑都未成功。然而，一旦秦王拔出了长剑，也就是荆轲倒毙之时。在秦国，不仅仅是秦王的剑长了“一点点”，秦军的制式装备都是加长版。考古工作证明了秦剑之长。战国时代，各国剑的长度大约在 30 至 70 厘米，而秦俑坑出土的三把秦剑，长度分别为 81 厘米、89 厘米、91.3 厘米，出土时候依然锋利如新。

要把“一寸长一寸强”的理念变成现实，是要有“本钱”的。秦国的冶炼工业掌握了精确的合金配比，出土秦剑经过测量，其锡含量为 21%，这可以让剑身的硬度和韧性恰到好处，即使剑身加长，也不易折断。秦国的冶炼工业还掌握了铬化技术，在武器表面形成保护层，确保装备不蚀不锈。秦剑其实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长度增加，二是宽度变窄，这样秦剑更加适合刺杀。秦剑器型变化或许意味着秦军对战场格斗技巧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根据实践证明，以相同的力量进行刺杀，相对劈砍，有更大的杀伤力。

除了剑，秦军的其他制式武器也都发展出了加长版。战国传

统战矛长度为三寻，大约 5.54 米，秦俑坑中发现的秦矛，其矛柄痕迹的长度就达到了 6.3 米，可以推测完整的秦矛长近 7 米。当然，有如此之长的兵器，秦军必定掌握了相应的实战阵法，那是另外一个讨论话题了。有了更长更坚韧更耐用的武器，成就了战场上的虎狼之势。

秦国武器生产标准统一，有利于大规模生产。秦军鼎盛时期，带甲百万，战事不断。如何为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一流兵器，是一个十分复杂艰巨的任务。秦国用标准化组织起了高效兵工生产体系，秦简《工律》中要求，“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出”，这对于生产者具有法律约束力。

在秦俑坑中，发现了大约 4 万支三棱箭镞，经过统一的打磨抛光处理；箭镞的截面是等边三角形，制作规整，误差极小。考古专家对箭头的金属成分进行分析，发现这数万支箭头的金属成分基本相同，可以推测它们是通过相同工艺生产出来的。

统一生产的可能不仅仅是箭镞。秦弩之强，天下闻名。秦弩厉害，关键在于弩机精巧，在射击的时候稳定性高，减小震颤的误差。而秦军的弩机实现了标准化、模块化生产。这种设计安排，可以使秦军就地实现装备重组和零件互换，有助于部队在消耗战中快速恢复战斗力，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秦国武器质量优良可靠，背后还有严格的监督追责体系。秦法严厉，世人皆知，那么到底产生到什么程度呢？1982 年，细致的文物工作者在天津的一批废铜烂铁中发现了一件残破的铜戈。据考证，这可能是一件秦王嬴政时

兵锐：秦军的秘密

□ 崔庆

代的兵器，上面有三行铭文，“十七年，丞相启、状；造，郃阳；嘉，丞兼，靡廉，工邛”。这支铜戈质量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的两位丞相启和状，生产地点是郃阳。项目负责人是工师“嘉”；“丞”是副工师，“兼”是他的名；“靡”是仓库武器保管员，名叫靡；“工”是具体制作这件铜戈的工匠，名叫郃。

每一个名字都是沉甸甸的责任。秦国的一件制式武器，从生产工人到仓库保管，从项目负责人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都要在产品上留下实名记录。《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一环扣一环，形成了层层倒逼、严密有效的负责、追责体系。最高问责，可以直至丞相。

天下大事必成于细。武装到牙齿的秦军，无怪乎能够成为虎狼之师，纵横天下了。